

宽容、开放、多元

——从经济理论发展到经济思想史研究

张旭昆

摘要：经济思想史的具体事实说明经济理论的发展需要宽容、开放、多元的学术环境与制度保障，而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有助于把握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规律与发展特征，有助于了解何种社会环境、学术氛围、政府政策有利于思想产品的有效生产。具体来说，研究经济思想史就是从五个问题出发，来研究经济学历史典籍，即“言之何物”“言之为何”“言之为谁”“言之对否”“言之要否”。为了进一步开创未来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就需要把经济思想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史、经济史，以及经济学邻近学科史统摄起来，以便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到经济思想史的演化法则。在这个分析过程中，也可以借助“思想市场”这一模式来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

关键词：宽容 开放 多元 思想市场

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历程出发，有两个基于比较视野的历史事实特别值得关注：一是16世纪以前，世界各地萌芽的传统经济思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中国的经济思想也未必落后于欧洲，而从16世纪开始，现代经济思想则主要起源并繁荣于欧洲，尤其是英国；二是19世纪，经济思想在欧洲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但是与法、德两国相比，英国的经济学明显占有优势。我们不禁要问，是何缘由促成了16世纪以来现代经济思想在欧洲的繁荣？又是何种学术环境造成19世纪英国经济学人才辈出，而法德两国相形见绌呢？

[作者简介] 张旭昆，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zhangxukun@sina.com。

经济学的系统理论一般以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 为开端, 也由此拉开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序幕。尔后, 经济学在英国延续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兴旺发展, 直到 1936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间, 经济学发展经历了三次革命和两次综合——斯密经济学自由主义革命、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 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的新古典综合。在这一百多年里, 英国的经济学始终保持着全球的领先地位。究其根本, 不外乎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二是英国经济学界一直保持着宽容、开放、多元的状态。

表 1 梳理的若干简单史实说明, 除了公认的斯密以外, 英国 (包括爱尔兰在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一个由政府钦定的经济学权威, 没有对斯密统一的标准解释, 没有经济学的统编教材、统一试卷, 也没有一锤定音的权威期刊。各个大学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学家, 宣传个人的学术观点; 每个学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学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平等地公开争论。最著名的例子包括 19 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 以及李嘉图学派的几位捍卫者与质疑李嘉图的其他学者之间的争论, 还有边际革命时期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对古典经济学的“揭竿而起”。这些自由的讨论为后来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遗产或思想基因, 也为英国经济学在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兴旺发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表 1 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发展的若干标志性事件

年份	标志性事件
1805 年	马尔萨斯开始主持英国东印度学院历史、商业与财政讲座。
1809 年	英国保守党创办《每季评论》。
1821 年	英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成立。
1824 年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创办《威斯敏斯特评论》, 宣传功利主义。
1825 年	英国牛津大学开设经济学讲座, 由纳索·威廉·西尼尔 (Nassau William Senior) 主持。

续表

年份	标志性事件
1828 年	英国伦敦大学开设经济学讲座,由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cCulloch)主持。
1832 年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开设经济学讲座,由塞缪尔·蒙迪福特·朗菲尔德(Samuel Mountifort Longfield)主持。

资料来源：由作者整理而来。

相较英国的状况，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学发展则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从有利的因素来说，法国紧随英国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 Say）早在 1803 年就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来宣传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而且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也一直被萨伊的几代教席继承人所延续，形成了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萨伊学派。但是，由于法国的教育制度要求大学生毕业必须通过国家规定的统一考试，这就束缚了法国经济学教授们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发挥。并且法国经济学界当时几乎被萨伊学派垄断，唯一的经济学出版社也由萨伊学派所掌控。这种思想垄断给法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一个重要案例就是提出双寡头理论的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在当时的法国几乎没有知音，更不用说去大学教授经济学；另一个案例则是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由于无法在法国得到教席，只得背井离乡前往瑞士洛桑大学任教。如果非要为萨伊学派指出某项最重要成果，那莫过于萨伊教席的第三任继承人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于 1860 年代表法国，与英国签订了实施自由贸易的“英法条约”，即《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而这只能算是应用性、实践性的成果，而非理论性的成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的萨伊学派，一旦垄断了法国的经济学思想市场，竟然使得法国的经济学发展大受困厄，只能落得个“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继法国之后，德国于 19 世纪中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适应本国发展的需要，德国历史学派表现出标新立异的特征：他们在政策上极力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强调国家干预主义；他们在方法上也不认同英国古典经济学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分析方法，更强调归纳推理和历史主义。但是就经济理论的创新贡献而言，在该学派统治德国经济学界的近一百年中，除

了通过归纳方法得到的恩格尔定律 (Engel's law) 和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 还有海因里希·冯·施塔克尔贝格 (Heinrich von Stackelberg) 的双寡头理论和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 等人的产业区位理论之外, 其他值得继承的思想成果实在乏善可陈。究其原因, 德国大学是政府附属机构, 其教授的遴选则必须通过政府程序。尤其是 19 世纪后期, 各校经济学教授的选择都必须经过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教育界在政府的代表古斯塔夫·冯·施莫勒 (Gustav von Schmoller) 教授的首肯。由此, 非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哪里还有什么出头之日。

19 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史充分说明, 尽管有着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大量实际问题, 但若经济学界没有宽容、开放、多元的学术氛围, 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独尊一派, 学生的毕业必须面对一张统一考卷, 教师的晋升必须按照统一的评审标准, 那么经济理论的发展必将大受束缚。

苏联的案例更是再次佐证了这一点。十月革命前后, 俄国的经济学发展几乎已经赶上了其他欧洲国家, 在微观层面有斯勒茨基方程 (Slutsky equation), 在宏观领域有康德拉季耶夫大周期 (Kondratieff Wave), 还有格里戈里·费尔德曼 (Grigorii Fel'dman) 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及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Yevgeni Preobrazhensky) 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 等等。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学术专断主义中断了苏联经济学的自然发展, 令人唏嘘。我们不禁要问, 今天的经济学还能从苏联时期的经济学中吸取多少有价值的思想吗? 相反,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riedrich von Hayek) 和弗雷德·曼维尔·泰勒 (Fred Manville Taylor)、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等活跃在西方世界的左右翼经济学家, 围绕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自由大争论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虽然这场争论对于当时东西方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即时的影响, 但双方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为后来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几十年后苏东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改革的政策走向。

历史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 宽容、开放、多元, 是经济学的繁荣之路; 而独尊、封闭、一元, 是经济学的死亡之途。

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

为了促进经济科学的兴旺发达，应该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中考察最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氛围，而介绍与研究经济理论发展演化的历史，正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与目的。本文这一部分试图揭示为何我们需要了解经济理论的历史，亦即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从单纯掌握基本原理的目标出发，举凡逻辑体系完善之学科，学生只要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就足以掌握其基本原理，而不必了解该学科的发展历史。譬如，欲掌握微积分的基本原理，似乎并不必要了解微积分的发展史。但是，若是从发展一门学科的目标出发，即便是逻辑体系完善之学科，仅仅掌握其逻辑推导过程也仍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当一门学科发生危机之时，了解它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20世纪初的物理学就经历过类似的状况。同时，那些没有形成完善统一逻辑体系的学科，如哲学，其发展史几乎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这在于后者的发展不会改变自然规律，只会发现以往不了解的规律；相反，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制度的演化，从而引起许多社会法则的变化，并导致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普列汉诺夫（1962：53）就曾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是在发展的，因此是在改变的。……社会在其发展中要通过某些阶段，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与这些阶段相适应的。”因此，依据先前的社会历史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即便其具有完善的逻辑体系，当面临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时，也往往难以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

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引起制度和法则的演化。经济学与实际经济生活之间存在一种正反馈的过程，而在此互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原有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以及难以解决的新问题：19世纪中期德国的经济发展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主张失灵，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马歇尔供求均衡论露出了破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则让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难堪。若主流经济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同时代的经济现象、可以有效论证同时代的经济政策，那么了解经济思想史似乎就没有多大必要。然而，一旦主流经济学不能胜任以上任务之时，了解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性就突显出来了。

从长远来看,为了推进经济科学的发展,愿意献身于经济学的学者有必要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在当时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但是对于解释以后的经济现象颇具启示作用的思想“基因”。换言之,整个经济思想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经济思想的丰富的“基因库”,其中有许多暂时不被当时的主流思想所接纳的理论观点;但是,当社会面临新问题、需要新解释时,这些非主流的思想成分往往能够给人以启迪,并帮助经济学家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历史充分证明了,当面对人类不确定的未来时,许多曾经非常有效的主流观点会由于新现象的出现而失去解释力,而以往有些被人们认作无用的,甚至是错误的异端思想,反而却能发挥效力。比如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在 17 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 19 世纪的马尔萨斯、萨伊等人那里就已经萌生;再比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早在 17 世纪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9 世纪的马尔萨斯和 20 世纪初的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那里草创。在一定程度上,马歇尔和凯恩斯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他们在熟谙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结果。

因此,了解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哪些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学家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发挥创造性、推出新思想产品,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规律和经济思想发展的特征,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何种学术环境、何种政府政策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

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五个问题

作为广义思想史的一部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经济学历史典籍所包含的经济思想。而研究这些典籍,可以简单总结为搞清五个问题,即“言之何物”(它说了什么)、“言之为何”(它为何这么说)、“言之为谁”(它为何这么说)、“言之对否”(它说的正确吗)与“言之要否”(它说的重要吗)。

所谓“言之何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些典籍究竟包含哪些经济思想。对于作者身后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典籍所包含的经济思想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象,它们构成了一种按时间排序的“客观的”经济思想史。但是从另外的方面来说,后来的研究者不可能单纯按照时间之先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录记,而必须对这些典籍加以提炼,拣选出其中研究者所认可的思想精华。

什么是思想精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所以这个“提炼”恰恰意味着经济思想史不可能是对经济思想历史的纯客观描述，而这种经过提炼的经济思想史，则可以被称为“主观的”经济思想史。值得强调的是，承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法完全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随意“打扮”经济思想史这个“小姑娘”，而必须遵循一定的“提炼”规则。只不过关于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而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生活的社会环境、个人的生活履历等因素，所以它们同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观察到的，往往是从形式到内容都各有千秋的“主观的”经济思想史。

根据本人的看法，经济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提炼”规则可以被总结为，应当尽可能全面、如实地介绍典籍作者的经济思想精华，当然其他人未必完全认同这一点。

所谓“精华”，是指经济思想必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种创新，绝不仅仅是指诸如新名词、新术语一类的文字表达上的创新，而必须有思想观点上的创新。这种思想观点的创新可以是与前人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观点，也可以是对前人观点的补充、深化、引申、发挥，还可以涉及前人未曾讨论的问题或论域。

所谓“全面”，是指在介绍典籍作者的思想精华时不要刻意遗漏。如果作者有A、B、C三方面的思想精华，就不应该只介绍A而遗漏B、C。^①当然，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或者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典籍作者的思想精华，经常会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往往源于研究者不能准确区分思想观点的重要性、正误性与创新性，他们往往不承认一些在其看来不重要，或者不正确的观点是思想精华。对于这一点，笔者坚持以“创新性”为标准来判断典籍作者思想观点是否为精华，即便这种观点似乎不重要，或许也不正确。笔者之所以提倡该立场，恰恰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曾经不重要、不正确的思想观点后来变得重要又正确的现象并不罕见，而曾经被普遍认为是重要且正确的思想观点后来变得无足轻重的现象也同样不罕见。

所谓“如实”，是指要基本符合典籍作者的原意，尽最大努力避免误读误释。思想史研究不能为尊者讳，隐瞒自己所尊重喜欢的典籍作者的不足和错误；

① 当然，如果需要专门研究经济思想某一个方面的专题史，那么对于典籍作者的思想精华按需选取，也未尝不可。

也不能为厌者张，夸大自己所厌恶不屑的典籍作者的不足和错误，回避其正确观点。当然，从解释和分析的主观性而言，要做到一丝一毫不走样也是困难的，但力求减少走样是应该的。这就好像是把典籍作者的思想精华 A、B、C 介绍成 a、b、c，但是绝不能把它们介绍成 x、y、z。同时，也要杜绝借题发挥，将典籍作者的思想随意引申发挥，就像把 A、B、C 介绍成 A⁺、B⁺、C⁺。更重要的是不能“借壳上市”，把典籍作者原本所没有的想法强加于他，借介绍典籍作者思想之机兜售研究者自己的思想观点。例如，我们绝不能像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学者那样，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场的《资本论》解释成一本论证市场经济的著作。此外，如实介绍还应当如实地反映典籍作者关注的重点，即使这个重点对于今天或许已经不再重要。例如，在介绍斯密的《国富论》时，就必须指出斯密关注的重点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致富的对策，而并非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在介绍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时，则必须指出价值论和分配论是他本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方面理论的学术价值已经远不及他关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重要。

当然，全面、如实地介绍典籍作者的原意并非易事。第一，言不达意是常有之事，作者的原意可能并没有在典籍中得到准确表达。这种现象，即便是高手大家也往往在所难免——比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曾经哀叹，“我觉得，我实际上想说的东西将永远说不出来”（斯威德伯格，2005：199）。第二，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其在不同典籍中表达的经济思想往往是变化的——或者是所关注问题的变化，或者是对同一个问题所持观点的变化。例如，斯密起初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写下了《道德情操论》；后来关心民富国强，写下了《国富论》；两本书对于人性就有了不同的提法。于是，斯密究竟如何看待人性，后来的学者之间就有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第三，有的典籍只是作者的未定文稿，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最终的想法，后人是难以确定的。例如《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又有谁能肯定，要是马克思再晚逝世几年的话，他不会对其进行修改呢？第四，典籍所用词汇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施莱尔马赫（2001：27）在《诠释学箴言》中写道：“一个语词的基本意义有时随着时间而改变，以致作品原来固有的意义将会失掉，而一种非固有的意义在阅读的过程中取代了它。”这种词汇含义的变化往往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不少的麻烦。例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政治算数》的内容其实是社会经济统计与预测；而之所以如此命名该书，则是

因为在配第生活的年代，“政治”一词的含义远比今天要丰富得多，而几乎等于今天“社会”一词的含义。类似地，了解了“政治”一词在那时的含义，就可以理解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为何会把他探讨社会正义的书命名为《政治正义论》。第五，经过翻译之后，典籍的原意往往难以被准确把握，尤其是考虑到两种语言的词汇之间通常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典籍是从其他译本转译的话，可能问题会更加严重。例如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许多论著，我国早年往往是从俄文和日文转译的，而中文译本最终是否完全符合德文的原意，这是需要存疑的。

基于上述五方面的原因，厘清典籍作者的原意，搞清他言之何物，就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一件艰难而又必须做的工作。只有把典籍言之何物搞清了，才能看清楚整个经济思想是如何发展演化的；同时，搞清楚典籍作者言之何物，也是搞清其他四个方面问题的基础。

所谓“言之为何”，就是要研究典籍作者为何会提出此种经济思想。只有搞清楚每个典籍“言之为何”，才能清晰明了地把握整个经济思想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不仅需要研究者细致地通晓典籍的文本，更要充分地知晓典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师承关系、人际网络、知识结构和宗教信仰等。

事实上，典籍作者之所以会形成或具有某种经济思想，往往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而任何简单化地将其归于某个单一因素的做法，都一定会造成谬误。比如学术界曾经广泛存在的所谓“阶级分析法”，就是把某个典籍作者的经济思想与其社会地位、阶级属性关联在一起；虽然该方法具有一些道理，但也往往闹出笑话。例如，若是按照社会地位来划分，李嘉图属于拥有大量地产的地主阶级，而马尔萨斯却是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穷知识分子。然而他们两人的思想观点与其阶级立场恰好相反：李嘉图主张废除谷物法，而这显然会损害地主的利益；马尔萨斯则为地主收取地租辩护。同样，恩格斯按照其社会地位，属于拥有股份的资产阶级；显然，他的观点完全不能从他的阶级属性去加以解释。熊彼特成长于贵族家庭，他一方面哀叹贵族阶级的衰亡，另一方面却又论证了他所不喜欢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同为剑桥大学教师的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凯恩斯，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所提出的对策迥然不同。因此，在研究每个典籍作者为何会具有某种经济思想时，必须分析多重原因，而千万不可简单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需要展开。

除了这些与作者本人有关的诸多影响要素以外，还需要指出一点——经

济思想的发展往往与其邻近学科有关。经济学的邻近学科有两类：第一类是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邻近的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第二类则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帮助的学科，包括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社会调查与实验、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其中，后一类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帮助的学科，其发展往往会较快地影响经济学；而前一类研究对象邻近的学科，其发展对同时代经济学的影响往往比较有限，但是，这些学科则很可能对之后时代的经济学产生滞后影响（熊彼特，2009：45—73）。但是具体到这种滞后有多久、这种滞后影响是什么，以及这种滞后影响的作用机制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所谓“言之为谁”，就是要研究典籍作者的经济思想，在主观上是想为什么人着想，而在客观上又有益于谁。从“言之为谁”与“言之为何”的区别来看，“言之为何”探究的是经济思想的来源，而“言之为谁”探究的则是经济思想的目的和效果。在实践中，有的典籍作者会明确宣布其目的，而有的则秘而不宣。加之作者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这就需要后世的研究者们仔细探究，切忌简单化地贴标签。例如，就斯密撰写《国富论》是为谁服务这一问题，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本人看来，这种理解实在是太牵强了。从《国富论》的内容可知，斯密本人对资产阶级绝无好感，他又怎么可能为了那个阶级的利益而提出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呢？至于从《国富论》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客观效果来看，不如说斯密是为所有消费者服务的。

所谓“言之对否”，就是要评价典籍作者的经济思想正确与否。具体而言，这需要区分典籍作者对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他提出的对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策，以及他所采用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判定经济理论和经济对策正确与否，其标准只能是长时期的实践，而不能是任何某个权威人士的观点意见。若是因为典籍作者的观点与某个权威人士不一样，就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这种判断标准未免过于落伍；这是中世纪经院学者，如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等人的惯用手法，实在不足为训。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个实践必须是长时间的实践，绝不能单凭短期的实践就宣称某种理论或政策的对错；尤其是考虑到一种理论或政策的短期效应，有时与其长期效应并不一致。例如，对于一些落后经济体来说，计划经济的短期效果确实不错，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主张计划经济的理论

和政策就是持久的真理，那就大谬不然了。同时要注意到，一种理论或对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而言的。例如，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或落后经济体来说，自由贸易就未必是金科玉律。另外还要注意到，一种理论或对策的正确与否，往往还要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言。例如，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对于具有相对劣势的产业群体来说，就未必是好事。而且，在评价判断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时，必须看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之间复杂的关系。第一，从长期看，经济理论不能纯粹是局限于理论范畴的某种智力游戏，那些不能推导和论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理论终将被淘汰。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不论其纯学术色彩如何浓烈，归根结底要能够推导和论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因此，在长期中，公众和政府对于经济制度、政策的需求最终制约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不过，在短期中，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其发展主要受纯理论考虑的影响，许多场合一时间看不出它的发展与制定制度、政策有什么关系。第二，经济理论与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样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也许可以从不同的经济理论推导而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纷纷实行了国有化，或带有国有化性质的经济政策；其中，有些国家遵循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而有些国家所依据的显然是另外的理论——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就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从另外角度而言，同样的经济理论也许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既可以导向斯大林模式，也可以导向南斯拉夫模式。第三，经济理论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唯一依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依据经济理论的同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制定还要依据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或经验。此外，为了符合逻辑，经济理论通常要依靠一些并不太符合现实的前提假定。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经济政策的成败来作为判断它所依据的经济理论对错的标准。

典籍作者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正确与否，应当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角度是技术或工具是否适应典籍作者研究的问题，另一个角度是技术或工具是否具有先进性。如果技术或工具不适应所研究的问题，那就可以说技术或工具使用不正确，即使技术或工具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可能还具有先进性。例如在研究小样本问题时采用计量方法。

所谓“言之要否”，就是要评价典籍所包含的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这里的重

要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它对于整个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性，或者说历史重要性，比如它是否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二是它对于当下的重要性，比如它是否可以指导如今的经济实践。有些经济思想无疑具有这两方面的重要性，例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它在历史上推进了国际贸易理论，并且在当代也依然具有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有些经济思想则只具有历史重要性而不具有现实重要性，例如，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就只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区分为斯密强调资本积累和节俭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点已经相对不再具有现实的重要性。

四、经济思想史研究展望与“思想市场”

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认识经济理论的演化发展、理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本身也涉及多重问题意识、多元分析视角，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文本阐释或思想梳理的维度。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尤其是涉及对其发展演化机理的研究，就需要研究者们有意识地拓宽视野，综合分析，把经济思想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史、经济史，甚至经济学邻近学科史都统摄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到经济思想史的演化法则。

如图1所示，经济思想、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经济状况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反馈关系，分别涉及经济思想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史、经济史三门学科的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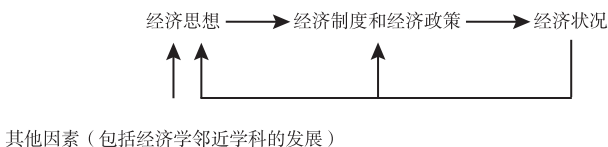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思想、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经济思想是会影响经济状况的，不过这种影响往往是以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作为中介的。而经济状况又会反馈影响经济思想的发展变化、反馈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因此，研究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就需要考虑它

与经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考虑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互动。同时，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学邻近学科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

以往那种把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做法，是由于把经济思想史（尤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史）的研究单纯作为理解某种主义经济学的前期准备。它显然无助于加深对经济思想发展演化机制的研究。英国经济思想史家因格拉门（1933：3）曾经写道：“政治经济学史须与人类的或任何一部分民族的经济史有区别。研究经济事实本身之递变是一事，研究关于事实的理想学说之递变又是一事。……可是这两类研究虽是界限分明，然而它们彼此的关系却是严密的。经济学说之发生和形成大半决定于当时的实际情形，需要和倾向。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变迁发生，新经济问题也随之而显露；每个时代盛行的学说，其获取力量，乃缘于它们似乎可解决当时急切问题之故。又是，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佔〔站〕在当代人们的上面或前方，也不过是他时代的产儿，他不能脱开他所生息游处的环境的。他一定会受他周围情境的影响，并特别受他同时代人们所共觉的实际事变的影响。”

研究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离不开对经济史状况的了解，这种了解可以通过表2的两类观察指标来进行。

表2 两类经济发展主要观察指标

第一类经济发展主要观察指标	第二类经济发展主要观察指标
国民收入(水平、增长率)	配第-克拉克系数(水平及变化)： 该指标反映产业结构、工业化、后工业化水平
通货膨胀率	霍夫曼系数(水平及变化)： 该指标反映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就业率	城市化系数(水平及变化)： 该指标反映社会结构
国际收支(总量、占比、变化)： 该指标反映国际竞争力	基尼系数(水平及变化)： 该指标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财政收支(总量、占比、变化)： 该指标反映政府影响力、干预经济的程度	恩格尔系数(水平及变化)： 该指标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收集、整理、分析这些观察指标的变化，进一步分析这些指标变化背后的制度、政策因素，再分析影响这些制度、政策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

思想所受制于的经济状况，就能把握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思想无疑受到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又无疑影响到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使英国在19世纪中期走向全面的经济自由主义；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又影响到了英国19世纪后期经济状况的走势，而这种走势最后又导致英国经济学界的反思，催生出英国经济学界的历史主义，以及马歇尔主张一定程度政府干预的新古典经济学。

除了从经济思想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史、经济史三者的互动来认识和把握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以外，也可以借助其他的分析工具或手段来拓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开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

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既涉及科学考古学的问题，又涉及科学心理学问题，也是一个典型的科学社会学问题。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思想史研究需要关心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就是要探讨哪些社会因素导致了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探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更加有利于经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探讨什么因素或机制导致了经济学的学术氛围在“宽容、开放、多元”与“独尊、封闭、一元”之间的分野。为了更系统地刻画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化，可以在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借助“思想市场”的概念，或者说“思想产品”的供求模式来加以分析（参见张旭昆，2001）。^①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思想市场上大体存在相对独立的三类需求主体，分别是政府、公众和学术团体。这三类主体的需求既相对独立，又有一定的交集；而在决定经济思想发展的长期趋势上，前两类主体的需求往往起着主要作用。从分析的意义来说，这三类主体的需求通常可以拆解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可称为“需求指向”，即需要解释哪些经济现象，需要解决哪些经济问题，而这三类主体的“需求指向”的并集，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对经济学思想需求的课题集合；第二个方面可称为“需求落点”，即应当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哪种政策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考虑到决定“需求指向”和“需求落点”的因素有所不同，因此，在分析需求的决定因素时，就必须区分“需求指向”的决定因素与“需求落点”的决定因素。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思想市场上的主要供给方就是经济学家，而供

^① 与物质产品相比较，思想产品具有五个特征：公共性、单件性（或斥重复性）、意义的模糊性、效用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

给所需的投入可以抽象为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和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其中，决定经济学家人数和素质主要包括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与生产其他学科思想产品以及从事科学活动与从事实际部门（政府、工商部门等）活动的相对收益（包括声誉、金钱和纯粹兴趣满足）；二是研究经济科学的相对难易程度。经济学家的知识资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包括经济学知识和非经济学知识。其中，经济学知识首先包括以往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说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更重要的还是以往分析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时所提出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分析方法，即熊彼特所谓的分析技术或分析工具；非经济学知识，包括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念，包括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包括各种基本能力，如发现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提出恰当假设的能力、为问题提供基本正确答案的能力、指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正确方向的洞察力，等等。

经济学家及其所掌握的知识资本决定了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它涵盖了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所可能生产的一切思想产品，决定了在既定条件下，经济学家及其知识资本能够解释哪些经济现象、解决哪些经济问题，反过来也决定了他们无法解释哪些现象、解决哪些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还要进一步受到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在那些受到世俗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非自由的、独断的思想市场中，能被允许生产的思想产品的范围一般要小于其生产可能性集合——这个受到约束的范围可以称作“思想产品的可允许生产集合”，它一般是思想产品生产可能性集合的真子集；而在那些自由的思想市场中，两者的边界一致。可允许生产集合只不过表明了，在资源和思想市场性质的约束下，有哪些思想产品可能被生产出来；但是，这些思想产品中究竟哪些被实际生产出来，则取决于经济学家们在追逐声誉、金钱和纯粹兴趣满足时的选题行为。这些选题行为无疑是思想市场中供给和需求双方相匹配的结果，而新思想产品总是出现在可允许生产集合与课题集合的交集之中。

参考文献：

普列汉诺夫，1962，《恩格斯的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俄译本第三版序言》，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施莱尔马赫，弗里德利希，2001，《诠释学箴言》，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

文选》，东方出版社。

斯威德伯格，理查德，2005，《熊彼特》，安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熊彼特，约瑟夫，2009，《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因格拉门，1933，《经济学史》，胡泽、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

张旭昆，2001，《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模式：以经济学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

Tolerance, Openness, and Diversit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Zhang Xukun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concrete facts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demonstr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requires a tolerant, open, and diverse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assuranc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al features of economic ideas. It further helps to identify what kind of social environment,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conducive to the effective production of economic idea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begins with fiv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classics of economics. These questions are “What is said”, “Why is it said”, “For whom is it said”, “Is it correct”, and “Is it significant”. To explore new areas in researching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related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and to find out the evolutionary law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this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can also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model of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Keywords: Tolerance, Openness, Diversity, Marketplace of Ideas

JEL Classification: A10, B10, B20

(责任编辑：何 伟)